

——“十七年文学批评”在整个十七年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关键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文艺。对作为整体的“十七年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今天更显得重要和必要。

阐释与建构： “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

刘志华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刘志华 著

|| 阐释与建构： “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阐释与建构：“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刘志华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615-6471-4

I. ①阐…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870 号

出 版 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刘 璐 牛跃天
封面设计 李嘉彬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青年项目 ·

项目批准号：09CZW054

自序

本书是我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结题成果,它主要建立在我的博士期间研究及最终的成果《“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的基础上。本书首先从“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几个关键词如“文艺斗争”“党性”“人性人情”“民族形式”“典型”“真实性”“现实主义”“人民性”“工农兵形象”入手,而这些关键词的形成与具体含义的不断改写,记录着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变迁的微妙症候。这些关键词成为我探查把握“十七年文学批评”真实面貌及其历史价值的切入口。通过对这几个关键词的具体研究并考察“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及其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在“十七年”里特有的“政治化审美”特征及其理论逻辑。有关论述便构成本书的第六章。

通过“关键词”透视“十七年文学批评”,我们发现,“十七年文学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十七年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关键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文艺。因此,如何对“十七年文学批评”进行较为全面的审美观照便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中国文学进入“社会主义”当代,其言说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多元格局构成因素之一的解放区文学,凭借权力和制度成为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母胎,文学被规整纳入“一体化”进程之中。文学批评日渐蜕变为对文学活动实施监管和对审美“利害”进行“裁决”的权力性存在。时代的政治风云和文坛风云在它的身上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它与文学“外部的”(政治体制、文艺政策等)和文学“内部的”(包括创作、理论、接受、编辑出版等)关系的复杂性,可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全部复杂性的一个缩影。会议报告、《文艺报》、《人民日报》社论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批评”可

供感知的外部环境。这是本书的第一章。

第二,作为特定时代且具有自身完整形态的“十七年文学批评”,经历了一个由发生、发展、异变直至异化的曲折变化过程。从十七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体化视角来看,“十七年文学批评”大致可以分为“解放区文艺批评的延续”“社会主义视野下的文学批评”“政治缝隙中的文学批评”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批评”四个阶段。其一,新政权的建立使得具有历史权宜性的解放区文艺批评在新中国得以推广并具有合理性。其二,文学批评的方向性、口号性功能特征悄悄地发生改变,它正逐渐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而在1953年开始被社会主义制度化,显示了新中国寻求建立新文学秩序、确立一体化的文学道路的真正用意。其三,侧重于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异变为“政治缝隙”中的文学批评,从中我们看到阶级性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尺,直至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批评时期。这是本书的第二章。

第三,“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发展,是与“五四”至30年代的现代文艺理念、解放区“革命文艺”、俄苏文学批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五四”至30年代的现代文艺理论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源头,其社会功利性特征、反映论、个性主义、阶级论、进化论等是“十七年文学批评”吸纳和扬弃的主要内容。正是“进化论”意识的持久牵导,引发了人们乌托邦的冲动和想象而不断地破旧立新,去建构一个崭新的迥异于任何时代的文艺秩序。“十七年文学批评”实践着解放区“革命文艺”理论体系,是解放区“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逻辑发展。解放区“革命文艺”理论体系中的“大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歌颂与暴露”“整风与批判”等内容直接影响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一体化”进程。俄苏的文艺政策、艺术社会学理论、庸俗社会学理论都在这一时期有了某种回应,成为“十七年文学批评”可供选择和吸收的重要域外资源。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高校文艺学教学及庸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三个方面来了解俄苏文学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影响和渗透。这是本书的第三章。

第四,我们讨论的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批评家。在文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的张力与合力中,“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类型相应地可划分为“政治革命”型阐释模式(以周

扬、邵荃麟为代表)、“泛意识形态性”型阐释模式(以冯雪峰和何其芳为代表)和“经验感悟”型阐释模式(以茅盾为主的作家型批评家及黄药眠、侯金镜为代表)。这是本书的第四章。

第五,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作家经历了角色转换的艰难蜕变过程,其“知识分子”内涵发生了巨大改变。作为群体,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地被整合到政治化权力格局之中,作家的创作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向。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十七年文学”,以其整体的“同一性”构建一个“战歌”与“颂歌”相交织的文学时代。“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全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遴选中涉及的有关重要话题的讨论——如《青春之歌》讨论中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创业史》中关于“农民本质”问题、《欧阳海之歌》中关于“塑造新时代英雄人物”问题,都体现了文学批评在当代的重要影响和它在参与当代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主动姿态。在十七年间,“批判”“革命”虽持续不断,但也会有短暂的间歇。而这些间歇是为未来更好地批判,间歇期间所出现的“非主流”又往往成为下一阶段批判的靶子,当批判硝烟过于浓烈则又会出现妥协的间歇。“批判—整饬—再批判—再整饬”,文艺思潮如风云变幻,似波涛诡谲,全息记录了当代文学批评曲折多变的历史命运。这是本书的第五章。

在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语境、生成历史、资源整合、批评类型、批评功能和关键词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后,我们可以返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语境中,不像过去那样因其政治性而肯定它,也不像现在一样以其政治性来否定它。我们应该把它放置在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乃至全球的背景中去理解和阐释这段文学的特殊性。“十七年文学批评”始终处于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自律性”“合情性”与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他律性”“合法性”的夹缝与交战之中,还在苦苦追寻文学与意识形态的临界点。本书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状态作了梳理,对它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初步思考和极有限的阐释。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层展开,还需要辅之大量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对对象的进一步历史化处理。

本书中一些章节先后在《陕西社会科学评论》《莆田学院学报》《学术论坛》《重庆三峡学院学报》《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兰州学刊》《内蒙古社会科学》《学术界》《社科纵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在此,对给予本课题厚爱以及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我完成本书的自我校对并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的眼前总会浮现读博时的情景。这个选题，也凝聚了我的导师席扬先生的心血。本来，他也答应为本书作序，令人无比悲痛惋惜的是，去年我在美国访学期间，我的导师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恩师——席扬先生，还有那从立项到出书的七年岁月！

是为自序。

刘志华

2016年1月13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政治性卡里斯马：“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文化语境	11
第二章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生成过程	31
第一节 产生：解放区文学批评的延续	32
第二节 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野下的文学批评	44
第三节 异变：“政治缝隙中”的文学批评	54
第四节 异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批评	67
第三章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文学资源及其整合	80
第一节 吸纳与批判：“十七年文学批评”与“五四”至 30 年代的现代文艺理念	82
第二节 张扬与革新：“十七年文学批评”与解放区 “革命文艺”的实践性体系	100
第三节 借鉴与改造：俄苏文学资源	121
第四章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批评类型	149
第一节 “政治本位”型阐释模式	149
第二节 “泛意识形态性”型阐释模式	178
第三节 “经验感悟”型阐释模式	198
第五章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批评功能	215
第一节 指导和规范：“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	216

第二节	践履和图解：“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作品的影响	229
第三节	批判和整饬：“十七年文学批评”对文艺 运动思潮的影响	240
第六章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几个关键词	256
第一节	文艺斗争：在政治与文学之间	256
第二节	人性、人情：在“合情”与“合法”的夹缝中	266
第三节	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	274
第四节	“典型”的“纯粹”与“负累”	282
余 论		293
参考文献		296

绪 论

一、研究价值

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研究,实际上都包括“文学批评史”和“批评的批评”两个方面的内容。“批评的批评”则又可以具体区分为“批评的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criticism)和“批评的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of criticism),实际批评的主要成分是诠释(interpretation)(包括描述和分析)与评价(evaluation)。^①就“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范畴和对象属性而言,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实际批评”都理所当然地属于本书研究的指涉内容。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本书的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更为关注“十七年”文学历史中关于作家和作品的“实际批评”。“十七年文学批评”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整个十七年文学史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关键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新秩序,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文艺。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和它充任的时代意识形态对文艺实施监管职责的复杂性,直接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独特”审美面貌的生成与变异。时代的政治风云和

^① 刘若愚. 中国文学理论[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2.

文坛风云在它身上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它与文学“外部的”（政治体制、文艺政策等）和文学“内部的”（包括创作、理论、接受、编辑出版等）关系的复杂性，可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全部复杂性的一个缩影。它对“五四”至30年代现代文艺理念的吸纳与扬弃、对解放区“革命文艺”实践性体系的张扬与革新，以及对执政党文艺政策核心理念的持久影响，都发挥了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对作为整体的“十七年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的精神遗产的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形成的文学价值多元化、文学泛化、文学边缘化、文学经典屡遭解构、文学理论和批评标准的丰富而又杂乱的今天，更显得重要和必要。

二、研究现状

对“十七年”文学的整体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它的“学术化”状况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有了根本性改观。“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十七年文学”的整体研究中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纵观新时期20多年来有关“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基本是从以下三种视角展开的：

一是文艺理论的视角，如浙江大学王建刚的博士论文《政治形态文艺学——五十年代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指导老师徐岱），该文基本观点是：50年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具有典型的政治形态，我们称为政治形态文艺。武汉大学李遇春的博士论文《权力·主体·话语》（指导老师於可训），该文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来进行研究，在其时性的话语结构层面上，集中探讨了置身于红色革命文学（文化）秩序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作家（包括从事“地下”写作的作家）的话语困境，揭示出这种话语困境植根于其心理人格困境，而后者源于其文化困境。

二是文化学的视角，如南京师范大学王洁的博士论文《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研究》（指导老师朱晓进），该文论述在服务论文学观的规定下，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发生着紧密的关系，这无疑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观念。从实践的层面看，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全面表现为与十七年政治文化的关系。十七年的政治文化，从物质制度、理论思想一直到心理层面全面参与规定着十七年的文学实践，十七年

政治文化在这三个层面全面地影响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学。对这一影响历程的历史描述,充分有效地揭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面目。黄开发的《“十七年”文学三论》(《江淮论坛》2004年第2期),认为“十七年”文学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贺仲明的《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该文认为,“十七年文学”受到较多政治扶持,也受到较多限制和改造,而且直接影响它的审美规范和文学标准。吕海琛的《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齐鲁学刊》2007年第1期),该文明确指出:“文学在迎合政治口令的同时淡化甚至是排除了其独特的审美特质,作家失去了表达内心独特感受的自由,创造力和想象力受到严重的压抑。文学成了政治的留声机和传声筒。”张卫中的《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该文认为与主要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现代文学相比,十七年文学主要是正面赞美、颂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甚至被作为国家动员体制的一部分。谢维强的《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十七年文学批评现象片论》(《理论月刊》2003年第3期),认为十七年的很多文学批判运动的深刻原因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隔膜与碰撞。於可训的《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隐含着十七年文学是一体化的文学的观点,认为近50年中国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一个在统一的文学体制和统一的文学观念与艺术规范支配之下的统一的文学世界。

三是文学批评的视角,如华东师范大学王军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合法性问题》(指导老师马以鑫),其基本观点是:十七年文学批评作为文学规范的体现者,在构建和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时,主要依据政治规范的支持,并按照其要求提出各种烦琐的价值和规则,来塑造文学的整体面貌,这些合法性规则与文学实践的合理性要求不断地发生冲突。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的合法性模式,造成了对文学合理性的压制,并最终颠覆了自身的合法性。单篇的论文较多,有侧重于从政治功能研究的,如黄开发的《真实性·倾向性·时代性——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几个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认为“十七年”是主流文学观念政权意识形态化时期。曹霞的《“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学术界》2012年第9期),指出,十七年中,“工农

兵”的批评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合力”日益弥紧。“工农兵”内在的话语机制和思维方式受到“泛政治化”的侵蚀,逐渐被掏空而成为承担政治监督、惩罚和行政处分等功能的“超级能指”。胡德才的《主体精神丧失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平庸化的根源》(《江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该文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治功利化的文学批评是非常盛行的。廖述毅的《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齐鲁学刊》2000年第10期),认为批评的聚集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有的侧重于“现代性”研究,如黄健的《“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该文指出,“十七年文学”之所以被赋予诸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它被认为能够通过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将有关现代性重构的诉求形象化地转化成人们的共识。有侧重于从话语方式研究的,如赫牧寰的《“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佳木斯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便面临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还有侧重于从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徐勇的《“权威”的出场——试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读者的实际功能和尴尬处境》(《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读者”作为一个虚拟的大多数,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讲述权力的权利的象征符号。还有从批评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等等。

总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界把“十七年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深切关注的研究成果尚属鲜见。即使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量著述中,对它的描述也多是以“文学运动”、“文学批判”代替对具体的“文学批评”的评价,“批评史”变成“批判史”。至于那些针对某些具有代表性批评家如周扬、冯雪峰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大多瞩目于他们的“政治传奇”或“文坛恩怨”方面。近年来,有关这一领域的零星星的成果应当说不少,但缺乏深入研究。总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把“十七年文学批评”视为“政治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如许志英、邹恬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一书中,把“十七年文学批评”视为“政治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批评追求的是政治价值,“其本质功能并不在于文学的研究评述与理论总结,而在于不断提醒文学履行政治功能,保持与政治的一体化”。许道明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新编》一书中认为,“十七年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体化时期,这是一个以政策推行政治——文学批评的时期,文学批评日渐迷失本性,几乎扮演了思想政治霸权同等物的角色,以“附庸”或“前哨”的身份,全面服务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文学批评崇尚单纯而透明及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杨匡汉在其主编的《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一书中认为,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实现文学一体化的任务。斯洛伐克的玛利安·高利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版)一书中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肯定应该高度评价中国现代的政治性文学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从1917年至1977年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六十年间所取得的意义最深远的最有价值的成果,都与这种思想(指的是一种世界意识,笔者注)分不开”。这是从“政治性”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两个方面诠释了“政治一体化”的内涵。华东师范大学王军的博士论文《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合法性问题》中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点鲜明而风格比较统一的文学阶段,它一般被称为“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特征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文学在基本价值、主要观点、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上高度的“同质化”,批评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同一化判断,它们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骨架,从而表现出“一体化”的面貌。第二,文学与政治的高度同一性。邓寒梅在《“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及其原因探析》(《船山学刊》2008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十七年文学”中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在于,“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和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双重合力,将文学活动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齐玉朝、徐丁林在《“十七年”文艺批评述评》(《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整体环境较为宽松,文艺批评寻求科学理性精神,但受“一体化”文艺思想制约,批评开始向政治斗争异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既有科学理性精神的高扬,又有科学理性精神的横遭践踏,科学理性与政治异化双重变奏的态势更为明显。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文艺批评在阶级斗争语境中力图自救,最终又别无选择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廖述毅在《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齐鲁学刊》2000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批评的聚集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

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来完成的。黄灵红在《“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三种类型及其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中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后的政论批评在政治一体化的文艺政策指导和规范下，建立了一整套以政治为本位的文艺的价值系统，政论批评有以党性代替人民性、文学性的趋势，政治倾向、作家立场成为文学批评无所不在、至高无上的标准，批评走向一条狭隘的政治夹缝之中。总之，他们普遍认同的是“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功能方面。

2. 这种文学批评样态的形成对十七年文学的发展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如对作家的影响、对作品的影响及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是研究者很少论及的。研究者大多看到的只是批评的指导作用即批评对创作的单向影响，而对于创作之于批评的反作用则大多视而不见或不屑论及。即便有所涉猎，也大多侧重于从创作主体角度而不是从接受角度（包括批评的角度）实施分析，如刘克宽在《从审美主体选择看十七年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成因》（《文史哲》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当代文学史上前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往往人为地将主客体双向之间的适应互动的选择重构关系释解为主体对客体（群体）的单向依附关系。”其在《当代十七年文学常规范式的文体表现》（《滨州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中还指出，十七年文学表现出同一类别的主题和人物的艺术认识规律的日益趋同，十七年文学观念的一体化，造成了创作方法理解上的封闭性，特别是在把文学创作方法作为一种描述方式和手段的时候，往往将惯常的方式视为一种规范，而排斥那些异常的审美创造，结果自然形成了尊崇常规范式的一统局面。在文学的外部关系上，我们可以找出许多造成十七年文学创作维持常规范式的原因，譬如政治的制导作用等。而如果进入文学的内部，从创作本身的建构来看，常规范式与十七年对创作方法的认识和选择是有直接关系的。至于说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建构、文艺思潮的变化等的影响则更是很少有人深入论及。

3. 对重要批评家在十七年文学历史中的具体活动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一时期虽然出版的许多著述，如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对周

扬、茅盾、胡风、邵荃麟、冯雪峰等批评家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他们所侧重的是现代时空而不是“十七年”。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创新目标

1. 把“十七年文学批评”视为“政治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显然表征了“五四文学正统论”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制约与规限。这一观念势必影响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独特性与价值呈现复杂性的客观体察。因此，把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十七年文学”笼统地视为“政治文学”，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如南京师范大学王洁的博士论文《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研究》认为，十七年的政治文化无疑构成了全面审视十七年文学的最佳历史视角，它将在最大限度内展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真实与历史全貌。赵海彦在《“为政治”与“逃逸政治”：“公众化写作”与“个体化写作”——对“十七年文学”两种创作现象的解读》（《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十七年文学最显明的时代特征是“为政治”。傅书华在《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2期）中认为，十七年文学是政治革命时代的文学。刘克宽在《当代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时代政治因素》（《琼州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当代十七年文学一体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于，政治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对文学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且作为维护整个大系统有序发展的一种外部制约机制。相应的，“五四”以来的批评具有多元性，如“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批评、“表现论”的浪漫主义批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印象式批评（李健吾）、心理分析批评（朱光潜）、古典主义批评（梁实秋）等，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历史批评（茅盾）、作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冯雪峰、周扬、胡风），自然的，“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批评”价值也被遮蔽，便只承认其“政治”价值而把它看成政治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便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文学批评固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在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中，那种“政治标准唯一”的量文尺子，那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以及那种机械地由作品社会效果逆推作家创作动机的“上纲上线”法不时出现，并愈演愈烈。可以说，这只是从文学批评的“外部”来看文学批评，把“十七年文学批评”